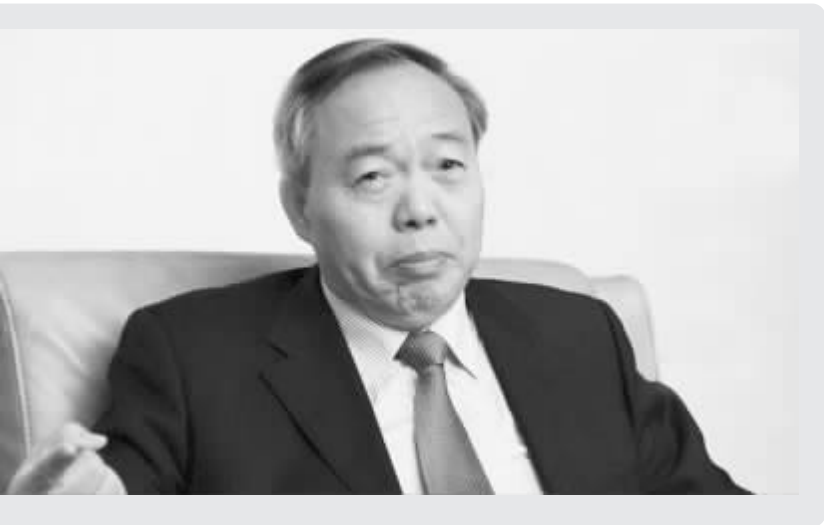


以全面小康为目标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 郑新立 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目前,城乡居民权益不平等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产权的不平等。城市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几乎已全部商品化,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厂房、设备、住宅等,都允许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而农村的土地、住宅等产权仍不明晰,农村对土地和房产等的生产资料产权仍不落实,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仍不能实现商品化、市场化。因此,农民就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化过程中不动产增值的收益。这是城乡居民基本权益上最大的不平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二是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尽管有 2.8 亿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农民工进城已二、三十年,但由于户籍的限制,他们享受不到城市户口所附加的各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绝大部分仍处于全家分离状态。从农民应有公民基本权益上说,这也是很不合理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提出“**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三项改革是对农村土地公有制实现方式的重大突破,是对农民住宅制度改革的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提出“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法人财产权上,使城乡居民拥有同等权益。

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是城乡差距的重要体现。包括养老、教育、医疗、交通、供水、供电、环境等,农村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公共服务事业投入重点在城市,城市越来越漂亮,即使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与沿海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民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由于公共服务的落后,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改变中西部农村公共服务落后状况,政府要把农村作为公共服务投入的重点,通过城乡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尽快弥补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欠账。近期应当把教育、医疗、交通、环保、养老作为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重点。要运用政府与企业合作(PPP)的模式来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业。沿海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比较好,主要在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很快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农村,主要通过自己增加投入,再加上地方政府帮助,把公共服务完善起来。中西部农村也必须走这条路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是城乡差距的集中反映。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是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最近几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速度超过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 2009 年的 3.3:1 缩小到 2013 年的 2.5:1,令人欣喜。继续保持这一势

头,从根本上说,要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又必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目前,一个农村劳动力平均只能种 7 亩地,如果在单季农业地区能种到 100—120 亩,双季农业地区能种到 50—60 亩,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能赶上社会平均水平,农民就能成为一个体面职业。在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凭借承包权将经营权有偿转让,这样既可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又有利于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要鼓励发展各类合作经济,特别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的股份合作社。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商贸流通业和乡村旅游业。继续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现在沿海城市许多地方招工难,家政服务人员短缺,一个月嫂的月收入达五、六千元。一家两口人外出打工,年收入可达 8—9 万元,加上土地转包收入,家庭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左右,一下子就可赶上或超过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所以,只要创造一个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已不是遥远的将来,而是近在咫尺。

实现城乡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关键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消除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土地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应发挥市场对土地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其他

要素不同的是,土地有一个用途管制问题。如果把耕地变为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并办理相应的法律手续。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已经明确,土地的占补平衡只能在省域范围内进行。但至今只能在少数县域范围内试点。应当推广重庆的经验,重庆经验的核心是远离城市的农村退出的宅基地,通过全市统一设置的地票市场,也能分享到城市市区土地的低级地租。对于可能出现的占好补差问题,通过建立第三方的土地质量评估机构,加强土地质量的监管,可以妥善解决。如能创造一个城乡要素自由、平等交换的制度,实现城乡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平原、浅丘陵区,用 5—10 年时间,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赶上沿海农民的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必须把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连在一起,同步推动。这三件事互相牵制,互相影响。农业现代化能够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潜力,为农

中国经济继续在世界经济中拓展

■ 刘劭 祁星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近日表示,中国致力于实现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之际,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继续拓展。

拉迪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2010 年以来,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都开始放缓,全球贸易减速明显。但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印记”仍在扩张,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仍在上升。他认为,“十三五”期间,适度放缓的经济增速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是合适的。中国经济保持在一定区间内运行,仍然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方。

谈到未来五年中国楼市、股市和债市的前景,拉迪说,中国不存在发生类似次贷危机那样的债务风险,虽然房地产投资下降会拖累经济增长,但是不会由此引发经济危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公司发展为企业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这种发展势头还将持续。对于中国股市,他的看法是促进更多有长远投资眼光的机构投资者加入,这样可以增加市场的稳定性。

拉迪说,他理解,力避“中等收入陷阱”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对此,他认为中国并未面临紧迫风险,但并非没有隐患,因此需要加以关注。在他看来,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一步加快国企改革,在关键领域引入更多竞争、提高效率。拉迪还认为,未来五年,中国还将吸引大量外商投资,但是外商投资的领域将从原先的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更多转向消费品的生产和服务业领域,建筑、机械制造等一些行业的服务需要调整发展策略。

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拉迪说,这将给中国经济和区域内经济体带来新希望。它将改善该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降低交通成本,其作用相当于降低关税、建立自贸区。但他同时也表示未来风险和机遇并存,仍有必要预见问题、趋利避害。

——紧接 02 版——

“互联网 +”时代回收业逆向物流商业模式研究

同时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规定居民有向正规回收点交电子废弃物的义务,通过积极的宣传和引导,提升居民的环保意识,营造良好的环保回收环境。

3.加强利益相关者合作。在电子废弃物产业链中,关联辅助行业的竞争力的大小即其上下游辅助部门的能力大小,也将影响其发展。金桥再生资源平台的战略是达成“企业运作,社会参与,政府引导”的良性循环,通过企业的良性运营逐渐吸引公众的参与,获得社会及政府的支持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企业这种在坚持自身战略发展方向的同时,加强与这些利益相关者合作的经验值得社会推广和借鉴。

4.大力发展再生资源平台经济。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阶段,平台经济以平台型企业为主导,整合各方力量,组成新的生态经济系统,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交易中介、信息服务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等功能,同时吸引各方资源,实现彼此增值,对加快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平台经济模式通过对企业、产业和市场进行整合,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乃至带动整个产业链创新。新的发展模式将突破传统的企业间对接,走向更高层次的平台对接。上海市依托信息、物流、互联网及金融等和平台经济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其平台经济发展尤为突出值得借鉴。在“互联网+”时代,各地市再生资源回收业应该整合回收系统、资源和信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将庞大的电子废弃物市场、处置商和原料供应商等联结起来,构建整个行业回收平台,形成产业集群规模效益。

小结

本文在逆向物流、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和利益者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三维调研框架,在走访多家回收企业的基础上,以金桥再生资源平台为案例,分析回收业逆向物流商业模式,探索“互联网+”条件下,环保行业未来的业态发展模式,推动和引导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创新,积极探索“互联网+回收”的模式及路径,积极支持智能回收、自动回收机等新型回收方式发展。由于主观条件的限制,本文调研的企业聚焦于电子产品回收企业,将在以后的研究中,拓展到整个环保行业,探索环保行业互联网转型切实可行的途径。

人民币能否成为下一个储备货币？

■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一个历史过程

应该说,中国从 1979 年改革开放到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从未正式想到人民币要成为世界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尽管在上世纪末官方机构曾提出过未来要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那只是相对于实现资本项下开放这一改革目标而言。

最早在中国学术界开始热议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是从 2008 年美国爆发“百年一遇”大危机开始。是美国危机给了我们重新思考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机遇。我曾在 2008 年底反复宣传,中国从 1949 年以来的金融史可以说有 3 个 30 年。第一个 30 年是 1949—1978 年,中国没有市场意义上的真正的金融,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 30 年是 1979—2008 年,经过 30 年改革,可以说中国的金融好容易成了世界金融棋盘中的一枚棋子,但是是在被动地、不自觉地下棋。从 2008 年截至的下一个 30 年,“路怎么走?”原来并不清楚,基本限于“华盛顿共识”的内容范围。是 2008 年的危机让我们看清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太平的重要根源之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缺陷。当时正值中国 GDP 实力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又正在赶超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二。赶超中国经济崛起的逻辑决定了,人民币不仅要追求普通小国金融开放一般意义上的本币可自由兑换,同样还要追求不管是出自中国利益还是世界经济稳定利益的大国货币的国际化目标。因为东南亚、亚太国家以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与中国这一大国的贸易需要相适应,稳定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样需要人民币能逐步承担起修补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更多的责任。简言之,其实是 21 世纪后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矛盾,决定了人民币要国际化,要承担起主要储备货币的责任。

但是,我们同样也清楚,和欧元可以在一夜之内宣布在某年某月某日实行流通并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不同,人民币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必然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时间的漫长性这一点上可比像美元。美元发挥主要的国际储备的功能其真正发迹的时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美元国际化地位的确立是在 1944 年。决定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这一历史过程的长短,主要是由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渐进特征所决定。因为人民币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必须基于在国际范围内的货币计价与交易的功能。在当今全球范围主要为

编者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于 10 月 22 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学会“人民币加入 SDR 国际研讨会”上发言。他表示:“在已经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 30%贡献率的大国经济体,其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一种历史趋势,谁也挡不住。是否加入 SDR,只是个时间问题,根本不用担心。”但他也强调,“人民币最终能否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不主要取决于是否加入 SDR(这是结果),而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不会因人民币不能加入 SDR 而停顿下来。”

浮动汇率的制度下,这一切又要求人民币必须浮动,资本管制必须取消。长期以来,中国汇率与资本管理的改革步子较慢,是与国内的企业改革等其他改革直接相关。特别是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生病,中国吃药过多”(宽松财政政策中 4 万亿人民币约 600—亿美元的刺激),遗留的系统性风险问题更是拖了汇率与资本管理改革之后腿。所以,21 世纪中只要不发生大的意外事件,我们在看到人民币必然成为下一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历史趋势的同时,又必须看到,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又是一个历史过程。

历史过程的简要回顾与依据

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功能的培育,对当今中国政府而言,在金融领域,重点在汇率和资本管理的改革。中国在继续几年来汇率渐进改革基础上,今年 8 月间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确定制度上,进行改革的同时,资本管理的改革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从 QFII、QDII 到 RQFII、RQDII,从“沪港通”到放宽境外央行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从上海自贸区等人民币离岸市场改革到允许境内自然人开办境外 PE 投资试点,从允许香港银行业在中国深圳发放人民币贷款到前不久刚刚宣布财政部以后按周滚动发行三月期国债,以培育储备资产功能等等。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

在汇率与资本管理改革的态度上始终是坚定不移的。

正是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使得一个被有些人认为不积极改革的国家及其货币,经过 2009 年以来短短六年的努力,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世界第四大支付货币,世界第六大交易货币。目前,已有超过 100 个国家的 1000 多家商业银行在使用人民币支付。有 30 多个国家的央行机构将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金额达 6700 亿元。中国的央行也已与 35 个国家的央行建立了货币互换协议,金额高达 3.1 万亿元。前不久,中国又宣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正式开始运营。如果外汇交易时间延长至晚上 11:30,可复盘欧洲市场时段。正如 Swift 的朋友所说,“我们每个月都能目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步。”

尽管如此,现在有人仍担心人民币的“自由使用”问题,无非是担心持有人民币后不能自由进出中国境内,无非是嫌中国境内的人民币市场“池子”太小。就前者而言,近几年事实表明,人民币进出的“池子”的通道是在不断地加宽。就后者而言,一系列数据表明,此担忧根本不必存在。目前,中国境内股市市值总额一直徘徊在全球第 2 和第 3 名之间,今年 5 月占全球市值的 10.8%。中国债券市场未偿余额 44 万亿元,排美日之后,为全球第三。信用债余额排美国之后,为全球第二。中国的货币市场交易规模 2015 年 8 月达到 45.1 万亿元。全球官方储备 2014 年底 11.59 万亿美元,按现有货币市场份额格局,如果拿出全球官方储备的 10%投入中国市场,折人民币仅 7.1 万亿元。如果分三份,等额分别投资中国的三个市场,如以上所述,则相当于中国今年 9 月底股票流通市值的 6.9%,债券市场规模的 5.4%。货币市场交易规模的 5.3%。尽管此例子不尽贴切,但是起码说明,正在不断扩大中国金融市场规模,是能够适应各国对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所需的各种功能。

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影响

人民币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逐渐确立,既然是适应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以及修补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是历史性趋势,自然,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的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结构的变化,肯定也是有利于国际间各货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善与修补的现实选择。

我们是寄希望一个超主权货币的出现,但是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现

实下,我也认为,更多的是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点上我同意蒙代尔的观点:从整个货币史看,金融大国从来是拒绝国际货币的改革。因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我 2009 年在中国国内说过,“一极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今后 20 年、30 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基本格局。即以美元为主,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多国货币的竞争与合作体系。

对于国际社会在以往以及今后就 SDR 作为超主权货币作出的各种努力,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因为毕竟这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是有利的。但是,对于 SDR 能否来完全替代现实国际货币体系的想法,我认为现在是过于理想化的。

所以,上述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功能培育的历程表明,对人民币加入 SDR 的态度一向是积极的。同时,基于对现实国际货币体系的清醒认识提出下述的观点,我认为同样也是需要的:即人民币加入 SDR 肯定有利于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是人民币最终能否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不主要取决于是否加入 SDR(这是结果),而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不会因人民币不能加入 SDR 而停顿下来。从长期看,如果人民币加入 SDR 后,中国央行的货币与利率政策,会通过 SDR 的货币篮子利率,影响美元利率,从而会缩小“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前财长约翰·康纳利)这一负面的国际溢出效益影响。从短期看,在当下中国与美欧日利率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国际主要货币国家央行的利率决策和中国央行自身的利率决策。如果世界上 188 个国家中有更多的国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使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有助于克服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缺陷。

作为小结语,由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是不会停止的,所以作为理性思考,谁都知道,已经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 30%贡献率的大国经济体,其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一种历史趋势,谁也挡不住。是否加入 SDR,只是个时间问题,根本不用担心。面对近 6 年快速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现实进程以及人民币已初步国际化的事实,有些人对人民币非加入 SDR 仍在提出各种额外的高门槛,无非说明了只是在充当国际金融市场上商业利益和投机利益需要代言人的角色。

进而对此我恰恰建议,中国政府,应在坚持金融开放不动摇的同时,在进一步开放上,应不设时间表。金融开放必须兼顾与中国境内各项改革的协调与配套。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恰恰是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贡献。